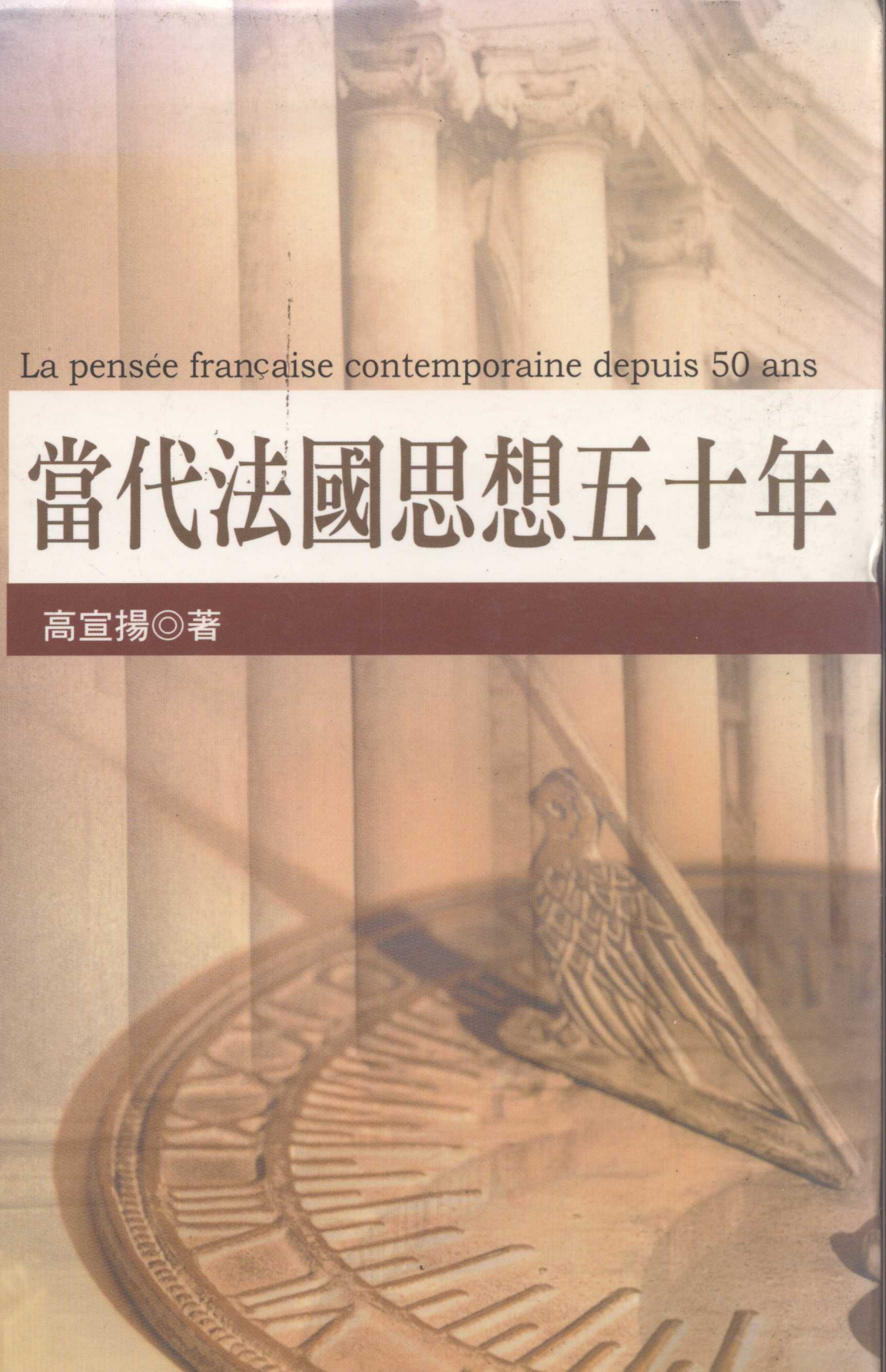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epia-toned photograph of class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upper half, several tall, fluted columns are visible, supporting an ornate entablature. In the lower half, a large, circular stone or metal base is shown, featuring a prominent winged figure, possibly a griffin or a similar mythical creature, standing on its edge.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his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depuis 50 ans

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

高宣揚◎著

B565.5
20052

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depuis 50 ans

高 宣 揚 著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哲學博士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 =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depuis 50 ans* / 高宣揚著. --

初版. -- 臺北市：五南, 2003[民 92]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1-3253-5（精裝）

1. 哲學 - 法國 - 歷史

146.09

92006023

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depuis 50 ans

作 者 高宣揚

編 輯 雅典編輯排版工作室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 真：(02)27066100

劃 撥：0106895-3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顧 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

版 刷 2003 年 4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920 元

有著作權・請予尊重

獻給

寧

自序

一九九八年我應邀為臺北誠品書店開設「當代法國思想歷程講座」，前後共十二講。講稿是我近十多年來在臺北各大學授課的講義作為基礎。但是，推動我研究當代法國思想的真正動力，其實是我本人在法國的長期學習、研究和生活過程本身。

自一九七九年移居法國巴黎以來，經過長期耳濡目染的過程，當代法國思想和整個法蘭西文化，已經潛移默化地薰染著我的心靈，形成為我的生命和靈魂的一個新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九八九年到臺灣東吳大學任教後，我所講授的課程，絕大部分都是圍繞當代法國思想和西方文化。同時，我一直繼續保持同當代法國思想家的聯絡和交往。每年寒暑假及休假期間，我幾乎都在充滿文化氣息的法國土地上度過：我一方面時時訪問當代著名的法國思想家，向他們請教，同他們探討與對話；另一方面，又在法國學術界和文化媒體中，廣泛收集和整理各種有關當代法國思想動態的最新研究資料。這樣一來，在法國二十多年的生活和研究，以及在臺灣教學期間對於法國思想的不停頓的探索過程，把我的精神生命帶領到一個新的廣闊境界。如果說，童年時代在印尼生活和學習期間所形成的早期心靈結構，已同青年時代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在北京大學所受到的教育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前半生精神生命的重要思想基礎的話，那麼，七〇年代末以來，在法國的學習、研究和生活過程，就為我原有的思想基礎加入了新的更為可貴的成分，以致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的精神生命獲得了「重生」，進入康德所說的「成熟」階段，從而開始具備進行自由地獨立思考的能力。

康德早在一七八四年寫給門德爾森（Moses Mendelsohn, 1729-1786）的信中曾說：「所謂『啟蒙』（Aufklärung; Lumières），就是人從其自身所造成的不成熟性中解脫出來；不成熟性指的是，在沒有別人引導的情況下，不能獨立使用自己的理智。這種不成熟性是自身造成的，因為它並不是由於自己

2 ● 當代法國思想五十年

缺乏理智，而是由於沒有決心和勇氣，在沒有他人指導的情況下獨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智」（*Kant, I. 1784*）。康德特別強調獨立使用自己的理智進行獨立思考的重要性，把它當成人是否完成啟蒙、並達到成熟階段的基本標誌。雖然康德的這段話，我早在五〇年代末，就已經在北大學習時熟讀過不止一次，但只有來到法國以後，才真正體會到它的深刻意義。

思想自由對於人來說是何等重要，只有在反覆經歷生活磨練和沈思之後，才能有所領悟。但領悟是一件事，真正將它轉變成自己的精神生命的基本原則，又是另一回事。敢於在任何情況下實現個人思想自由，談何容易。正因為這樣，我才說，既使到法國後，我仍然只能說，自己至多也不過「開始具備進行自由地獨立思考的能力」。敢於自由地進行獨立思考，對我來說，還僅僅是開始。我個人的思想成長經歷，一再地感受到達成「思想成熟」的艱難和曲折。我是在「不惑之年」到達法國。近二十多年，表面看來，我的生命已經跨越了孔子所說的「知天命」和「從心所欲」的門檻，並正一步一步地邁向「不逾矩」的「古稀之年」。但個人思想和精神生命實際上仍未完全成熟；在許多重大事件和問題面前，往往「惑」然躊躇，無所適從，難於、或沒有勇氣做出正確抉擇。

然而，在法國的二十多年來的生活，畢竟使我幸運地親身經歷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最深刻的理論典範轉換的階段，生活於人類歷史和文化發生急劇變化的世紀轉折的關鍵時刻。這是西方「現代性」（*modernité*）文化經歷近四百年成長、發展和反覆危機的過程之後，終於達到自覺地進行自我反省和全面自我批判的時代，因而也是「現代性」達到成熟階段的標誌。在我面前展現的，是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連續不斷進行的自由學術爭論所帶來的理論建設和文化重構的活躍繁榮局面。精神分析學（*psychanalyse*）、存在主義、新馬克思主義（*néo-marxisme*）、符號論（*sémiologie; sémiotique*）、詮釋學（*herméneutique*）、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e*）、解構主義（*déconstructionisme; déconstructivisme*）、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e*）、新女性主義（*néo-féminisme*）和後現代主義，各種理論派別、意識形

態和科學理論，先後登場，各抒己見，一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創造局面。拙著《後現代論》序言中已經說過，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就是在我剛到巴黎時發表他的《後現代的條件》。一九八〇年，偉大的思想家沙特和羅蘭·巴特先後去世的事件，曾經給我很大的心靈震盪，激勵著我以更加狂熱的情感，潛心閱讀他們的著作，並認真思考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他們的先後逝世，使我感受到時間的緊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以最大的效率投入研究。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當我在巴黎大學準備和撰寫博士論文《論霍爾克海默的唯物論》時，在北大時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馬克思思想觀點，開始同在法國時期所感染的各種新思想相互交錯和進行對話，構成了我本人思想轉變中最緊張和最有意義的新階段。當時，我獲得機會，先後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學和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等著名高等學府，直接聆聽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 ）、李克爾（Paul Ricoeur, 1913- ）、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 ）、維爾南（Jean-Pierre Vernant, 1914- ）、杜美濟（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及謝爾（Michel Serres, 1930- ）等人的講演、課程和研討會，並利用各種機會與當代法國各重要思想家會面，同他們直接對話，討論共同感興趣的理論問題。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八年，我獲巴黎第十大學副校長拉畢卡（Georges Labica, 1930- ）教授同意，參與他所領導的科學研究小組，並成為他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同時，我也很幸運，能在我的指導教授維德琳（Hélène Védrine）和奧里維耶·勒沃·達倫（Olivier Revault D'Allonnes, 1923- ）的推薦下，在著名哲學家德里達、法國哲學會主席賈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 ）和拉畢卡的幫助下，在當時由密特朗總統直接推

動下成立的巴黎國際哲學研究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中，連續兩年主持關於現代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比較研究的研討會。當時任國際哲學研究院院長的德里達，還數次接見我，鼓勵我探討中國文字與西方文字的差異性及其對文化傳統模式的影響。他說他很關心語言、文字、言說、思想與整個文化結構的關係，對於不同於西方拼音文字的中國文字深感興趣。當我受臺灣國科會邀請成為東吳大學教授之後，拉畢卡教授仍然讓我繼續兼任研究員的工作，不斷地在他所主持的研究刊物上發表論文。一九九〇年當我講授和研究西方社會思想史、並思考其中的艱難問題時，法蘭西學院的維爾南教授剛剛發表他的著作《古希臘時期有關個人、死亡、自身與他人的問題》（Vernant, 1989）。他把個人的人格和身分的自我認識和社會確認的複雜問題，同人對於「不朽」的無止盡探尋的思維活動聯繫在一起。他認為，只有人，才存在「人格」和「身分」的問題，才把這些問題同認識自身、認識生活、認識歷史、認識社會和認識世界的活動聯繫在一起，同自己的生存及死亡、同自己的社會歷史命運聯繫在一起。他的深刻思想同哈娜·阿蓮（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及米爾西亞·埃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的思想觀點結合在一起，給了我重重一擊，粉碎了我原有的世界觀框架，使我驚訝地、猛然地重新發現人的原本面貌，也對自己的生命重新進行了反思。

我深深感到：人只有在同社會和文化的反覆對話中，才能最終認識自己，才能真正認識世界。從根本上說，人在一生中，不管是誰，只要他確實期望生命變得有意義，就要不斷超越和逾越現實，並又不斷回到現實世界；在「虛無」與有形世界之間循環遊走。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實踐，就成為了反覆超越的中介。正是在這裡，我才真正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同一意義；而且，也領悟到唯有透過死亡才能表現生命。人只有在理解到生命與死亡的同樣意義之後，才對於自己的生活命運有所瞭解，才能夠使自己的生活在有形的世界中擴展到無形的世界，並將兩者連接在一起，在兩者之間進行反覆的穿越和往返，不斷反思生命的意義。我不是教徒。在北大讀書和研究多年，

使我不想加入任何宗教組織。但到了法國以後，透過對於人的本質的探討和各種論戰的參與，更深入地理解了宗教同人的本質的必然聯繫；這種必然聯繫，就如同人的本質同哲學、科學認識以及同藝術的必然聯繫一樣，是哲學家 and 所有的人理解人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命運的基礎。宗教經常被人誤解為迷信權威（*autorité*），崇拜偶像的愚人寶物。但真正的宗教卻引導人不只是關心個人生死禍福，更注重教導要關懷「他人」，像佛家那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像耶穌（*Jésus*）那樣，為全人類的命運，寧願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使人類獲得永恆的幸福，犧牲個人生命在所不惜。我在法國看到各種類型的天主教徒，他們多數是有思想，又有高尚的情操，對於人的生與死、個人與世界、有形與無形，都有深刻的沈思和反思。

我非常感謝法國的當代思想家們以及許多無名的普通法國人對於我的思想教育和心靈薰陶。正是他們給了我新的生命，使我走出個人的生命圈，不斷擴大自己的生命圈的範圍、而同整個人類文化的生命體融合在一起。

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對於法國思想界來說，已經完成了從單純接受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Hegel, Husserl, Heidegger*，法國人簡稱為「3H」）和「三位懷疑大師」馬克思、尼采、佛洛依德（*Marx, Nietzsche, Freud, 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法國人簡稱為「3M」）思想影響的時代，轉向具有獨創性的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新時代；也就是完成了從對於黑格爾辯證法、胡塞爾現象學和海德格存在論的推崇，從對於馬克思、尼采和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的懷疑精神的追求，轉向以自身思想創造為基礎的自成思想體系的成熟階段。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世紀交接時刻，歷經三十多年的爭論和創造，在法國思想激烈變動的洪流中，不只是可以看到法國社會生活圖景以及各種物質的、有形的社會宏觀架構的變革結果，而且，連同那些隱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稟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無聲無息中影響到行為舉止的各種心態和思想風格的變革，也表露無遺。越是深入細膩地探索其中的奧秘，就越感受到支持著這一切變化的深刻理論基礎所隱藏的強大思想力量。法國人那種浪漫自在的生活情調背後，往往包含著深刻的自由反思活動，以

至於當人們無意中觸犯他們的普通日常生活方式時，他們就會情不自禁嚴肅地捍衛其個人選擇的自由，使他們原本閑逸多姿的情趣，剎時間變成情緒高昂的基本人權辯護士。就在巴黎亂哄哄的地下鐵車廂中，可以隨時看到處於混亂卻又高度自律的讀書人，任吵雜的車輪聲和說話聲於不顧、而坦然自若地翻書閱報。只有細細考察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消化他們的歷史傳統中隱含的思想，才能逐漸發現法國近五十年一切變化的思想根源。

法國當代思想的演變及其創造性，往往是伴隨著整個社會日常生活方式的變化，伴隨著社會思潮及生活時尚的變動，伴隨著廣大人民大眾思想風格及思維模式的轉變。法國思想界及其精神創造活動同整個社會思潮的緊密關係，是法國思想和文化長期發展及普及化的結果，也是法國人思想風格獨特性及其熱愛思想自由的產物。布朗索（Maurice Blanchot, 1907-）曾對法國老百姓中所表達的「公眾意見」（l'opinion publique）的性質，發表過深刻的分析和評論。他認為，在所謂「公眾意見」與「傳言」（la rumeur）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公眾意見是傳播於各種報刊中的看法和說詞，但它們從來都不會被準確地登載於特定的書報中；而傳言在實際上是經人們消化、吸收、理解、並產生一定看法的某些判斷（Blanchot, M. 1969: 26）。所以，流傳於特定時期的思想和思潮，雖然一方面同探討這些思想觀點的作品的出版和流傳有一定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們、特別是思想界的敏銳分子，早已有所察覺，成為先知先覺，他們往往早在這些思想被廣泛討論之前，就已經有深刻的見解和洞見，致使他們更自覺地集中鑽研他們的作品，並透過他們的研究和討論，散播於更大的範圍內，從而經一段時間之後，這些思想就成為社會思潮。例如，梅洛彭迪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一段時間，人們和思想界對於胡賽爾現象學之所以產生濃厚興趣，並不是因為胡賽爾現象學作品的法文版的發表，而是因為當時的思想界和法國相當數量的人，已經從自己的現實社會生活的經驗中，深深感受到現象學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意義。他說：「正是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發現了現象學的統一性及其真正意義。」（Merleau-Ponty, M. 1945: 11）。因此，問題不在於研究或確

定法國特定時代的思想論題是否同黑格爾、胡賽爾、海德格、馬克思、尼采或佛洛伊德的原著精神相符合，而是在於研究為什麼在這個時期、而不是在別的時期，人們對於這些思想感興趣；探討當時法國思想界和社會大眾是在什麼樣社會文化條件下集中研究和爭論它們的。

法國當代思想的活躍及其獨創性，還深深地扎根於法國普通教育活動和社會文化傳統之中。我在法國期間，經常為法國高中（Lycée）哲學教育的深刻性和靈活性所感動。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深度，為大學、研究所以及思想界理解和創造新的哲學觀點和理論奠定了基礎。當代法國偉大的哲學家，如沙特、阿蘭（Alain, Emile-Auguste Chartier, 1868-1951）、德勒茲、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等人，都曾經當過中學哲學教師。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的中學教師，不管是文科的還是數理化科學的，都有深厚的哲學基礎。他們在中學授課時，經常從哲學基礎出發，具體分析和討論各學科的專業問題。法國青年人高中畢業時，為了獲得高中畢業文憑（Baccalauréat），必須首先通過非常嚴格的全國性的哲學論文（la dissertation philosophique）國家考試。最近幾年，連續多次在巴黎咖啡店舉行哲學討論會（Café philo），最著名的哲學家都積極參加，與普通咖啡店的市民顧客們面對面地討論哲學問題。因此，從中學生、大學生到普通市民，對於哲學問題都發生興趣；而那些最普及的報刊雜誌也無例外地時常討論哲學論題，把哲學同最生動的日常生活事務聯繫在一起。所有這些，形成了法國當代思想取得偉大成就的廣泛社會基礎。

這本書試圖簡單地總結半個世紀中法國思想發展的基本狀況，同時也從理論上總結個人二十多年來旅居法國時期，在生活、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對於法國當代思想的理解程度。但由於受到個人思想和生活環境的限制，各種缺點和瑕疵在所難免。我熱誠地希望它的出版能夠引起讀者熱烈的反應。

在撰寫本書過程中，我多次與法國思想家進行過討論，其中包括李維史陀、布爾迪厄、李克爾（Paul Ricoeur, 1913- ）、拉畢卡和賈克·董特等教授。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前任法國哲學會主席、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賈克·

董特對我的一貫的支持和鼓勵。每當我遇到各種難題，他都會以知無不言、誨而不倦的態度，向我提供資料線索，並同我一起分析。當他知道這部歷經二十多年的準備、沈思和反覆推敲的書稿即將問世出版時，他欣然執筆寫序。這是對我的最大的鼓勵，也是本書讀者的榮幸。

高宣揚

2003 年春於巴黎東郊

Marne La Vallée 寒舍

賈克·董特序（中文版）

對於一位法國人來說，獲悉中國公眾從此將擁有一幅關於法國當代思想的寬廣圖畫，該是多麼高興！這幅畫，除了高教授，再也找不到別的任何一人，可以比他更好地描繪出來；他在近幾十年來，生活在法國，積極地參加各種最重要的研討會、學術會議和代表大會，還密切注意法國書籍、雜誌和期刊的出版狀況，並會見過許多法國名流，同他們對話；與此同時，更不用說，他還向法國人介紹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為了這部經長期努力而出版的著作，請允許我表達熱誠的謝意！

高教授以其周密的洞見，將最近五十年，呈現為一個整體；這一整體，並不是人為地勾劃出來，而是由實際的歷史自發地構成。關於精神活動，最好不要過於嚴謹地劃定日期。在各個學科的平行發展中，在各種不同的、然而由於具有共同方向的內容而相互聯繫的各種著作之間，往往滑行著或多或少比較明顯的時間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二十世紀末之間所展現的這個時期，儘管有大量的各種類型的產品，確實形成了一個可證實的同一體。走出第二個千禧年，並不僅僅標誌著一個年代上的分段；透過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崩潰，美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對於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權的確立，中國令人印象深刻地發展成為強勢而又有威望的國家，以及與此同時，亞洲的尊嚴普遍地受到確認，所有這一切，使人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里程碑式的斷裂。

在兩個時端之間所發生的這些實際演化、進步和倒退，在法國思想的鏡面上，往往以非常生動活潑，有時忠實，但更經常的，是以折射或變形的方式，反映出來；就好像在別的民族那裡，也以另一種方式所做過的那樣。法國的發展的最清晰的特徵，也許就是他們同過去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決裂，或者，是他們在主觀意願上同過去的決裂。而與此同時，他們以更加善意的態度接受外國的，特別是德國的影響。法國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往昔成果是非

常豐碩的。在那些偉大的思想家當中，笛卡爾，舉例來說，就為觀念論提供了新的基礎，並使之同現代科學聯繫在一起。十八世紀的清醒的批判和唯物主義，為法國文化銘刻了到處受到稱頌和羨慕的、不可磨滅的標記。

當然，這些舊有的成果，在今天並不是完全受到否定。但新的思潮似乎更多地傾向於忘卻這些富有盛譽的過去；或甚至對它抱有恨意。在很短時間內，各種各樣的理論，突然產生、盛行、並消失；它們自詡徹底翻新，狂熱地強調、並致力於他們的區別性，同時又相互粗暴而激烈地進行爭鬥。在哲學、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以及精神治療學等領域，在一種瘋狂競爭的環境中，上述各種理論在反對它們的前身的過程中成長起來。這就像一種古怪的賽跑，但實際上，真實的情況，往往是在語詞的彩漆之下，新鮮的東西比他們所期望的還少，決裂也並不是那麼徹底。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各種命運陪伴下、沿著其自身的道路發展的傳統基督教哲學和馬克思主義之旁，冒出了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知識論學派和後現代主義。

人們都知道所發生的這一切。所有這些，隨著時間流逝，相互評估，也許會出現同樣的某些誇張；但以反面的意義來說，它們猶如曇花一現的流行。對於患有特殊疾病的法國來說，文化流行的不停的表演是輕而易舉發生的。

接著，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所有這些泡沫般的動盪既然已經緩和下來，法國似乎處在一種欠缺的狀態。再也沒有新鮮東西！這個國家期待新的英雄們，由他們魯莽地攪動文化舞臺，並再次喚醒他們的嗜眠麻木之徒來充當演員。

在世界各地引起那麼多反響的這場法國式震盪，還剩下什麼？

由於獲得確實的和具有敏銳洞察力的告知，高宣揚這部書的讀者，享有能夠客觀地從外部對這些豐富內容進行理解和判斷的特權。該輪到民族學家們和知識社會學家們，去研究和評價這些民族學和社會學；該由哲學家們去思考這種哲學：以他們依據中國思想精神所形成的標準來判斷。他們是否表

現嚴謹？根據科學的公正態度，人們期望這樣。

但很瞭解中國朋友的法國人，知道中國友人，會以致使法國人經常興奮的盛譽，使用閃爍的語詞和方式，清醒和友善地接納那些真理的顆粒和有價值的意願。所以，高宣揚在這裡扮演了「說情者」的角色：接受這些知識和反思的燦爛花朵，但不要把它們當作神聖不可觸犯的偶像，而是把它們當成某種珍貴的原始資料，然後，以此為基礎，輪到你們自己去加工創造。做出符合明理的選擇，使你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產生出新成果吧！

但願每個民族，每種文化，都能夠以它們本地和合時宜的方式，以歷史的節奏，透過它們的奉獻，為他者服務。謹此致以同事之情誼。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be 'J. Derrida',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and underlined.

Avant-propos

Quelle joie, pour un Français, d'apprendre que le public chinois va désormais disposer d'un vaste panorama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 Ce tableau ne pouvait être brossé par personne d'autre mieux que par le professeur Khà qui a vécu en France même l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qui a participé activement aux séminaires, aux colloques, aux congrès les plus importants, qui a suivi attentivement la publication des livres et des revues, qui a rencontré les célébrités et dialogué avec elles - sans manquer pour autant, d'ailleurs, de faire connaître réciproquement aux Français la vie intellectuelle chinoise. Qu'il soit chaleureusement remercié pour cette œuvre de longue haleine !

Ces cinquante dernières années s'offraient à mon regard avisé comme un ensemble, non pas découpé artificiellement, mais comme spontanément constitué par l'histoire effective. En ce qui concerne l'activité spirituelle, il convient de ne pas fixer trop rigoureusement les dates. Des décalages temporels plus ou moins importants se glissent entre les développements parallèles de disciplines et de travaux divers, pourtant étroitement associés par l'orientation commune de leurs contenus. La période qui s'étend entre la fin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et la fin du deuxième millénaire, forme bien une unité identifiable, malgré la grande variété de ses productions en tous genres. L'issue du deuxième millénaire ne marque pas seulement une fragmentation chronologique : elle impose une rupture événementielle décisive, avec l'effondrement du stalinisme dans l'Est européen, la confirmation de la domination économique et militaire des U.S.A. dans une grande partie du monde, l'impressionnante montée en puissance et en prestige de la Chine et, conjointement, la reconnaissance universelle de la dignité de l'Afrique.

Les évolutions réelles, les progrès et les régressions survenus

2

entre ces deux limites se reflètent d'une manière très vivante, parfois fidèle, mais le plus souvent réfractée et déformée dans le miroir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mme ils le font aussi, autrement, dans la conscience des autres nations. Ce qui singularise peut-être le plus nettement les développements français, c'est leur rupture, ou en tout cas leur volonté subjective de rupture avec le passé intellectuel de ce pays, et, du même coup, leur accueil beaucoup plus complaisant aux influences étrangères, notamment allemandes. Le passé intellectuel de la France est somptueux. Descartes, entre autres grands penseurs, avait par exemple, parvenu l'idéalisme philosophique d'un nouveau fondement, en l'associant à la science moderne; la critique lucide et le matérialisme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marquaie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d'un sceau ineffaçable, honore et admire partout.

Bien sûr, ces performances anciennes n'ont pas été unanimement reniées, de nos jours. Mais les tendances nouvelles se sont montrées plutôt oubliieuses de ce passé prestigieux, ou même hostiles à lui. En très peu de temps requièrent, règnèrent et moururent toutes sortes de doctrines qui prétendaient innover radicalement, qui accentuaient et cultivaient leur différence avec fureur, se combattaient violemment les unes les autres, avec véhémence. Elles s'élevaient, chacune contre ses antécédents, dans une frénétique concurrence, en philosophie, en sociologie, en ethnologie, en linguistique, en psychiatrie, etc. Ce fut comme une course à l'originalité - alors qu'en son fond le propos était souvent, sous le vernis des mots, moins neuf qu'il ne le voulait, et pas si radicale la rupture...

Ainsi vit-on surgir la phénoménologie, l'existentialisme, le structuralisme, l'épidémiologisme, le post-modernisme, à côté de la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traditionnelle et du marxisme qui poursuivaient leur propre cheminement avec des fortunes diverses.

On sait ce qu'il en est advenu. Tout cela, le temps passant, s'est vu taxer, avec peut-être la même exagération, mais en sens inverse, de mode éphémère, et le défilé incessant des modes culturelles paraît facilement pour une maladie caractéristique de la France.

Puis, dans le moment actuel, toute cette effervescence s'étant provisoirement apaisée, le pays semble souffrir d'un état de manque, plus de nouveauté. Le pays attend l'apparition du nouveau héros qui réanimera témérairement, une fois